

一 争取和平的挫折

1. 胜利后的谈判

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政府在美国投掷原子弹、苏联对日宣战、中国军队即将全面反攻、各战场节节败退的极端不利形势下，被迫决定无条件投降。次日，日本天皇以录音广播方式向全国宣读了投降诏书。曾经凶顽一时、给中国、亚洲、以至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日本侵略者，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打击下，低下了自己那曾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的头颅。中国人民取得了1840年以来对外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，这是中国历史永远载入史册的一页辉煌。

饱经八年战火离乱摧残的中国人民最渴望的就是和平，他们渴望休养生息，重建自己的家园和祖国。然而，战后的中国，和平似乎还

是在天边漂浮的一抹云，让人可望而不可及。国民党执政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，因为国民党的政策依旧而不断发展，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自然不利于和平。更重要的是，代表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国共两大党，对战后中国的发展前途各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，而国民党长期一党专政的思维理念根本不容自己的对手合法生存。因此，国共两党因为抗击共同敌人而暂时搁置的矛盾分歧，战后立即显现出来。更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自接收日本投降，其军队推进途中，必然与主要在敌后作战的中共军队发生冲突。内战的阴影驱之不去，中国向何处去，成为摆在所有党派与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紧迫而急待解决的问题。

就在日本投降的当天，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邀请电，请“先生克日惠临陪都，共同商讨有关问题”。此后，蒋介石又于8月20日、23日连发两电，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，以使“重要问题，方得迅速解决”。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姿态，既有敷衍国内外舆论企盼中国和平的考虑，也有争取时间，进行政治、军事各方面布置的需要。蒋介石企图通过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，掌握战后政治的主动权。

中国共产党对战后中国发展的态度是明确

的。中共一方面要求扩大解放区，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，另一方面力争和平，反对内战，同时不抱幻想，不怕威胁，随时准备以自卫战争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。在收到蒋介石的邀请后，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三人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，以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，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，打乱国民党的部署。8月25日，中共发出《对目前时局的宣言》，提出和平、民主、团结三大口号，以及解决时局问题的六项要求，向全国人民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8月28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一行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，自延安飞抵重庆。毛泽东在机场发表谈话，认为“目前最迫切者，为保证国内和平，实施民主政治，巩固国内团结”。其他各项问题，均应在在此基础上求得合理解决，以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。当晚，蒋介石会见了毛泽东一行。

重庆国共最高级别的谈判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大家无不希望双方坦诚相见，达成有利于国家进步发展的解决办法。但是，谈判的进程并不轻松，双方立场相距甚远。国民党坚持的是，“军令政令必须统一”，实际也就

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，垄断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权力。中共坚持的是，双方平等协商，共同参与国政，国民党应该尊重中共的权利与地位。在谈判中，围绕党派会议、国民大会、宪法草案、受降等问题，双方各有方案，交锋不断，尤其是在解放区与军队改编两大关键问题上，更是争执不下。国民党坚决不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，并对中共军队改编数字极力压缩。中共在谈判中采取了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立场，可以让步或妥协之处，尽可能让步，以显示诚意，争取民心。比如，中共同意在一定前提下，承认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领导；主动从南方 8 个地区撤出自己的军队；中共军队的改编数字也从起初要求的 48 个师减为 20 个师。但是，对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及解放区政权这样的原则问题，中共决不让步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中共代表周恩来、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、张群、张治中、邵力子进行了十几次谈判，毛泽东和蒋介石也有几次单独会商，但在解放区政权与军队改编问题上，双方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。

10月10日，国共双方代表签署《会谈纪要》，通称“双十协定”。协定提出：以和平、民主、团结、统一为基础，国共长期合作。坚

决避免内战，建设独立、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；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、宪草诸问题；保证人民各项自由；党派平等合法；释放政治犯；等等。关于改编中共军队及解放区政权问题，留待以后继续商谈。

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虽然这次谈判并未解决多少实质性问题，也无论国民党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毕竟国民党不能不承认中共的地位，不能不坐下来与中共商谈中国的前途，这本身就说明，中共已经是中国政坛谁也无法轻视的力量。这是中共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，既表明中共的胜利，也预示着国民党处理国内问题时很难自己一家说了算。重庆谈判期间，除了谈判桌上的交锋外，毛泽东、周恩来还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，如民主人士张澜、黄炎培、沈钧儒、章伯钧、罗隆基等，实业家刘鸿生、吴蕴初、范旭东等，国民党人孙科、于右任、覃振等，包括国民党内反共强硬派戴季陶、吴稚晖、白崇禧等，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，广交朋友，取得了政治上的有利地位。

10月11日，毛泽东返回延安。通过重庆谈判，国共双方确认了和平、民主、团结、统一的原则，确认合作建国，反映了全国民众一

致的要求。但是，纸上的文字并不等于现实。国民党从来也不愿放弃一党独尊的地位，还在谈判期间，蒋介石便下发“剿匪手本”，命令部下“努力进剿，迅速达成任务”。其后，国民党军事会议又作出一系列部署，以“接收”为名的内战很快烽烟四起，国内局势为内战的乌云笼罩。

2. 接收声中烽烟起

从抗战胜利之日起，内战实际上就开始了，这首先是因为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而引发的。8月11日，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次日，蒋介石发出三道命令，要求国民党军队“加强作战，积极推进”，“不得稍有松懈”；要求中共军队“应就原地驻防待命”，“勿再擅自移动”；要求日伪军“应就现在驻地，安谧地方”，“维持地方治安”。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，蒋介石于15日指令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，要求日军“停止一切军事行动”，“保持现有态势，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，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”。具体负责受降的何应钦，在给冈村的指令中要求，凡非蒋介石或他本人指定之受降军官及代表和部队，日军绝

对不得移交，并应拒绝其通过，防止其占领城市。很显然，国民党企图通过垄断受降权，阻止中共力量的进一步发展，使自己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。

然而，现实并不能如国民党的意。国民党企图剥夺中共及其军队受降权的举动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坚持抗战八年的中共的反击。8月10日至11日，延安总部连发七道命令，要求人民军队“积极举行进攻，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”，“如遇抵抗，应坚决消灭之”。由于中共军队多在敌后，位置有利，日本投降后迅速出击，很快收复了大量敌战区及中小城市，控制了相当数量的交通线，使解放区面积达到了近百万平方公里。国民党主力部队远在大后方，在依靠空运接收了南京、上海、北平、天津、武汉、郑州、广州等大城市后，对广大敌占区的接收，尤其是华北、华东部分地区，需要通过解放区，或者要接收的已经是解放区，这就必然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，引发内战。

中共对国民党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的举动保持着高度警惕。8月11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》，指出“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”，“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，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，对付

内战”，同时要求“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，脱离分散游击状态”，编组正规兵团，准备集中行动。各解放区先后编成了野战部队合计近 60 万人，形成了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山东、华中 4 支野战军，随时可以对付国民党的进攻。

随着形势的发展，9 月 19 日，中共中央发出指示：“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，是继续打击敌伪，完全控制热、察两省，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。”这个方针被概括为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。这是一个对解放战争全过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战略方针，中共首先全力争取东北，控制东北，为自己争得了有利战略地位。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，中共将山东主力调往东北，华东苏北主力调往山东，江南主力撤往江北，整个北线力量得到大大加强，同时以南线其他力量牵制国民党。

面对国民党以“接收”为名的向北推进，中共部署了以平汉、平绥、同蒲、津浦等铁路线为重点的防御行动，用“纠缠扭打的战法”，疲劳与消耗对手，迟滞国民党军的推进，掩护东北与热察的战略展开。

国民党的“接收”重点是华北，其目的是控制华北，分割中共各区联系，进而北出东

北。国民党向华北的推进以铁路线为枢纽，十二战区傅作义部 6 个军，沿平绥路东进张家口；二战区阎锡山部 7 个军沿同蒲路进太原后南出上党地区；十一战区孙连仲部 3 个军沿平汉路北进邯郸。国共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冲突首先发生在上党地区。

上党地区位于山西东南部，包括长治、长子、壶关、屯留等地。阎锡山部占领该地后，一方面可以呼应平汉与同蒲路方向的作战，一方面也成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包袱，使其无法腾出力量来策应其他战场，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刘伯承、邓小平坚决消灭阎部。刘、邓遂集中太行、太岳、冀南三部分主力，发起上党战役。战役以攻城、围城打援方式进行，9月10日，太行部队首先攻打屯留，因阎部不敢出援，屯留、长子、潞城、壶关先后被攻占，接着长治被包围。阎锡山急令 3 个军 7 个师 2 万余人出援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立即改变部署，决定以一部继续围攻长治，以主力围歼援敌。10月2日，援敌在屯留东北被围，经 3 日激战，全歼敌 1.6 万人。长治守军见增援无望，8日弃城突围，12日在逃跑途中被全歼。此役，阎部被歼 3.5 万人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被打死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俘，成为解放

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。

紧随上党战役，平汉路形势又趋紧张。9月中旬，国民党第三十军、四十军、新八军所部8个师4.5万人，由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、高树勋指挥，沿平汉路北上，连续占领解放区多座县城。10月14日，该部自新乡继续北上，直指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邯郸。已经占领石家庄的国民党军则准备南下支援，南北对进打通平汉路。

中共对平汉路敌情极为重视，认为能否打破国民党的企图，关系保卫华北、争取东北的战略全局，要求晋冀鲁豫军区全力打好这一仗。刘伯承、邓小平立即抽调主力部队数万人，集结于冀、豫两省交界处的漳河北岸，寻机歼敌，同时以地方武装不断袭扰敌军，迟滞其行动，分散其兵力，阻挠其补给，使其疲惫。22日，国民党军渡过漳河，误以为对方兵弱，轻敌冒进，被诱至无险可守地区，晋冀鲁豫部队突以优势兵力将敌包围，28日发起总攻。重点攻击四十军，对本非国民党嫡系的新八军高树勋部则利用矛盾，进行政治争取。军区参谋长李达亲至新八军洽谈，终于争取高树勋率部近万人于30日在马头镇起义。剩余敌军全线动摇，突围南逃，被分割包围。北路

石家庄、南路安阳援军行动迟缓。11月2日，被围敌军除少数突围逃走外，全部被歼，马法五被俘。此役，晋冀鲁豫部队以伤亡8000人的代价，争取国民党军8000人起义，毙敌3000，俘敌1.7万。整个战役打得干脆利落，军政全胜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典范战例之

与平汉战役进行的同时，刘、邓指挥太岳军区部队进行同蒲路南段作战，控制了晋南部分地区与同蒲路南段部分铁路，牵制了阎锡山、胡宗南的部队。

平绥路是华北国共冲突的又一主要战场。平绥路连接晋绥、晋察冀、冀热辽三大解放区，这三区构成中共华北区的中心地区，西接陕甘宁，东邻东北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国民党企图首先占领绥远、察哈尔全境，然后夺占热河，割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大区的联系。十二战区傅作义部担当了平绥路行动。他以主力三十五军为核心，集结了7万人的兵力，8月11日自绥远五原出发，15日进包头，18日占归绥（该城已被中共军队攻下大半），26日到集宁。至9月中旬，傅部基本集结于集宁、丰镇、大同一线，先头部队离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不过几十公里，已对晋察冀区形

成很大威胁。

平绥路战略地位重要，为国共双方必争之地。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聂荣臻与晋绥贺龙组织平绥战役，打击国民党气势，强调此战“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。”晋察冀、晋绥两区遂集中主力 5 万余人，由聂荣臻、贺龙指挥，发起平绥战役，目标是歼灭傅部主力，解放绥远。10 月 18 日，聂荣臻部发起攻击，至 23 日，连占丰镇、集宁，控制平绥路 100 余公里。贺龙部于 25 日攻占卓资山，歼敌 4000 人。傅作义部队退至归绥周围固守。中共中央指示前线准备攻占归绥、包头，解放绥远全境。

10 月 30 日，晋察冀、晋绥两军开始扫荡归绥外围，至 11 月 10 日已切断归绥包头铁路，完全包围了归绥。但是对归绥城内的进攻并不顺利。傅部凭坚固守，火力占优，攻城部队兵力并不占优势，而且缺乏攻坚经验与器材，几次攻势均未得手，双方形成拉锯战。此时塞外天寒地冻，土工困难，部队冬装不齐，减员增加。指挥部决定，以晋察冀一部围困归绥，以晋绥部队及晋察冀一部改攻包头。

包头有国民党守军 1 万多人。晋绥部队已在 11 月 7 日组织了一次攻城战斗，未能成功。

主力到达后，12月2日再度攻城，仍未取得预期战果。久攻不利，屯兵于坚城之下，有被敌反击、截断退路之险。晋绥、晋察冀部队根据情况，先后在12月4日撤围包头，14日撤围归绥，结束平绥战役，转入休整。此次战役，迫使傅作义部队放弃攻占绥、察计划，退守归绥、包头，并切断了绥远傅部与山西阎部的联系，有一定意义。但由于作战部署不够明确，对傅部未能迅速分割包围歼灭，使其得以收缩固守，后期打成了消耗战，而且由于各方面准备不够，攻击归绥、包头失利，未能完全达成中共战前预期目标。

华东是国共冲突的另一重要地区。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，历来为其所重视。国民党“接收”部队的主力就摆在华东地区，多达13个军，30余万人。中共的主要目标，是由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，在华中野战军配合下，阻击沿津浦路北上的国民党军。双方的战斗从10月一直打到次年1月停战，历时3个月之久。

10月18日，山东野战军进攻邹县，次日占领县城，切断了津浦路。此后，国民党军多次进攻邹县，均被击退。11月中旬，山野又进行了临城外围破袭战，控制、破坏了大段铁

路。12月14日，山野攻占滕县，此后与国民党军在鲁南沿运河对峙。1946年初，山野对临城、枣庄、兖州、泰安发动全面攻击，至13日停战令生效停止。这一阶段的战斗，规模虽不很大，但控制了一大段津浦路，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北上企图。此外，山野还在胶济路沿线作战，切断了胶济路。华中野战军在苏北作战，占领了盐城、高邮等城，控制了陇海路东段。

中共组织向南防御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向北发展，重点是东北。还在抗战结束前夕的中共七大上，毛泽东已提到东北的重要，认为只要有了东北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必然的。日本投降后，冀热辽解放区的部队首先进入东北。8月30日，冀热辽部队占领山海关。9月6日，先遣纵队曾克林部进入沈阳。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军队14年来第一次走在沈阳的大街上，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。其后冀热辽主力部队进入东北，很快占领了营口、大石桥、瓦房店、安东、铁岭、四平、通化等城，控制了辽宁、吉林两省大片地区，部队增加到10余万人。9月中旬，曾克林到延安汇报情况。中共中央认为，国民党在东北没有统治基础，长途运兵困难甚多，而冀热辽区与东北相邻，胶东与辽东

隔海相望，使中共部队具有进入东北的有利条件，加之苏联占领东北，对中共发展持同情态度，此为中共“千载一时之机”。为此，中共中央发出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的指示，全力争取东北，中共中央组建东北局，由彭真任书记，陈云任副书记，派出彭真、陈云、高岗、张闻天 4 位政治局委员，1/4 以上的中央委员及党政干部 2 万余人前往东北工作。9 月 18 日，彭真到达沈阳。

与此同时，中共决定调大军出关。先后调往东北的有，罗荣桓率领的山东军区机关及 5 个主力师 6 万余人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 3 万余人，晋察冀部队万余人，陕甘宁部队万余人，共计近 11 万人。同时调往东北的还有，由山东、华中、晋察冀、晋冀鲁豫抽出的 100 个团的架子，配备从班长、排长、连长直到营、团长的干部，供扩充部队之用，并将抗大总校迁往东北。所有部队接到命令后，兼程行进，餐风露宿，分从海路（胶东至辽东）、陆路（热河至东北）赶往东北。11 月，中共调往东北的部队统一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（次年 1 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），林彪任司令员，彭真任第一政委，罗荣桓任第二政委。部队到年底已发展到 23 万人，控制了东北县旗的近一

半，并广泛开展了消灭日伪、肃奸剿匪、发动群众的工作。

由于苏联的反对，国民党企图在大连等港登陆“接收”东北的计划未能实现。但国民党深知东北的重要，在美国支持下，改在秦皇岛登陆，准备沿北宁路进入东北。中共起先指示东北部队集中主力进行阻击，不使国民党军进入东北。

11月5日，国民党美械化十三军开始正面进攻出关门户山海关，另一支美械化部队五十二军则以迂回行动从侧翼配合。该两部训练有素，火力强大，步炮空协同，对东北中共部队形成强大压力。中共部队经长途跋涉，刚到东北，部队疲劳，指挥不顺，供应缺乏，民情不熟，新扩部队未经战斗锻炼，战斗力不强，实力对比居于劣势。16日，国民党军占领山海关，其后沿北宁路步步推进，尾追撤退的中共部队，22日占锦西，26日占锦州，进展速度甚快。

根据东北的现实情况，林彪认为不应仓促与国民党军作战，而应首先整顿部队，寻找作战时机。中共中央亦于11月下旬发出指示，要求东北“放开大路，占领两厢”，12月28日又指示东北局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。据

此，东北主力后撤，成立北满、南满、东满、西满 4 个军区，分散休整，训练剿匪，发动群众，改变集中作战部署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，在国共对东北的争夺中占据了主动地位。

12月中旬，国民党军为切断中共东北区与华北区的联系，对关内外交通枢纽、热河省会承德发动攻击。东路由十三军、五十二军沿锦承路，西路由十六军、九十二军沿北平至古北口公路，南路由九十四军由唐山向喜峰口，三路围攻承德。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泉、古北口、喜峰口进行阻击，至 1946 年 1 月停战令生效，国民党军未能攻占承德。

从抗战胜利到 1946 年 1 月发布停战令，国民党军主要是以“接收”为名，向各地推进，由此引发国共在部分地区发生激烈冲突。中共部队主要是以阻击战、交通战形式，迟滞国民党军的推进，掩护自己的战略展开，同时争取以自卫反击制止内战，实现和平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1946 年 1 月国共发布停战令，双方冲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。

3. 昙花一现的和平

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的战场实况表明，国